

19世纪80—90年代汉城的山东商人 ——对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档案的考察

刘畅(山东大学韩国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摘要】1882年朝鲜爆发“壬午兵变”之后,华商开始进入朝鲜市场,而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的缔结则为中朝贸易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法律保障。以往学术界多认为仁川是华商势力最集中的地区,针对华商和韩国华侨的研究也多以仁川为中心。但从相关档案资料的统计上看,19世纪80—90年代山东出身的华商则主要集中在汉城。本文主要通过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的考查,分析中朝近代通商以来山东商人进驻汉城的人数和店铺情况,并对其变化原因进行了探讨,从而找出了旅居汉城之山东商人的一些特点。

【关键词】山东商人;汉城;清商;华商

一、前言

山东半岛与朝鲜隔海相望,自古以来,山东半岛居民与朝鲜居民就多有交往。明清时期,山东半岛在中朝交往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成为中朝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援助朝鲜反击倭寇侵略的战略基地,同时山东半岛在西学对朝鲜的传播与中日朝商品贸易方

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①特别是近代中朝通商以后,山东在中朝经济往来中更是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烟台与朝鲜的贸易额曾一度占到中朝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在朝鲜从事贸易的华商也大部分来自于山东^②,这部分人就是今天韩国华侨的始祖。因此,近代山东与朝鲜半岛关系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以往学术界多认为仁川是华商势力最集中的地区,针对华商和韩国华侨的研究也多以仁川为中心。^③诚然仁川地区的华人数量较多,但从相关档案资料的统计上看,山东商人则主要集中在汉城。遗憾的是,有关汉城的山东商人研究到目前为止还相当薄弱。杨昭全先生利用《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对1882—1910年间朝鲜的华侨进行了统计,其中有一部分内容涉及旅居汉城的山东商人的情况。^④这一研究可谓有关本课题的最初尝试,但由于此书成书于中韩建交以前,当时缺少可供参考的资料,致使部分统计还不够完整。韩国有关近代清朝商人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多未对其籍贯进行细化,而是从整体上对华商进行研究。^⑤马仲可从社会学的角度也对山东华侨进行了研究,其中部分内容涉及了在汉城的山东华商的情

① 朱亚非:《论明清时期山东半岛与朝鲜的交往》,《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第81页。

② 中韩两国的学术界一般将在朝鲜的清商称为“清商”,但从当时的档案文件来看,正式的称呼应该为“华商”,为与史料保持一致,将在文中使用“华商”这一称呼。

③ 李玉莲:《仁川华侨社会的形成和展开》,韩国仁川文化财团,2008年。

④ 杨昭全、孙玉梅:《朝鲜华侨史》,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版。

⑤ [韩]李源明:《韩国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以清商的海路贸易和走私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首尔国立大学,1967年;[韩]陈清全:《李朝末期的韩中贸易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庆熙大学,1972年;[韩]谭永盛:《朝鲜末期的清国商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檀国大学,1976年;[韩]金钟国:《朝鲜后期对清贸易一考察》,《震檀学报》1977年总第43期;[韩]李星宽(音译):《19世纪末在朝鲜的清商活动研究》,《全北史学》2008年总第32期。

况。^①学术界针对汉城的山东商人研究较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中韩关系研究在我国史学界中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相关史料的发掘工作多有不足。而中韩两国学者间由于语言和地域的关系经常出现闭门造车的现象,在研究中很少借鉴对方的成果。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最近公开的档案史料对于本研究的深入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涉及朝鲜山东商人的档案主要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全宗的《朝鲜档》和《驻韩使馆保存档案》两部分。其中《朝鲜档》的 5045 个文件曾于民国 61 年出版为《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而《驻韩使馆保存档案》部分则为首次公开。

本文将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档案资料对中朝近代通商以来山东商人进入汉城的人数进行考察,并对其变化原因进行分析,从而找出旅居汉城的山东商人的特点,以期能够深化近代山东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研究。

二、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的缔结与 陈树棠时期的山东商人

在封建时代,朝鲜一直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中的一员,在 19 世纪以前与西欧国家更是毫无接触。进入 19 世纪以后,西方列强进入东亚,打开了中国和日本的大门,朝鲜也未能幸免。1876 年朝鲜被迫与日本签署了《江华岛条约》,即《朝日修好条规》,从此朝鲜的门户洞开。

《江华岛条约》缔结后,日本侵略者对朝鲜的经济渗透和军事控制变本加厉,这激起了朝鲜民众强烈的反感。在朝鲜统治集团内

① [韩]马仲可:《山东华侨研究》,新星出版社 2005 年版。

部,闵妃与大院君争夺权利的内讧愈演愈烈。^① 1882年6月,朝鲜爆发了旨在反对日本侵略和闵氏政权的“壬午兵变”。为此日本向朝鲜派遣了4艘军舰和一个步兵大队。清政府为与日本抗衡,在水师提督丁汝昌和道员马建忠的指挥下,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率领3000多名清兵搭乘3艘军舰抵达马山浦。与清军同行的另有40名商人,他们随行的目的本来是向驻朝的清军提供生活必需品,但在清军驻朝的两年多时间里,他们也与当地的朝鲜人进行了商业往来。可见,华商最初是借助清政府“兵商同一政策”进入朝鲜的。^② 由于当时的兵船是从中国南方调来的,因此有学者认为这40名商人主要是中国的南方商人。^③ 但相关档案显示兵船曾经在烟台靠岸,^④因而也不能排除这40名商人来自山东的可能。无论他们来自哪里,可以肯定的是,这40名商人为山东商人进入朝鲜市场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882年10月,清与朝鲜签署了《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与山东商人进入汉城相关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条:北洋大臣札派商务委员前往驻扎朝鲜已开口岸,专为照料本国商民。

第二条:中国商民在朝鲜口岸如自行控告,听归中国商务委员审断。

第三条:两国商船听其驶入彼此通商口岸交易。

① 徐万民:《中韩关系史》(近代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

② (韩国)《中央日报》1979年9月21日。

③ 李玉莲:《仁川华侨社会的形成和展开》,韩国仁川文化财团,第45页。

④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以下简称《档案》),本文中使用的档案均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全宗中《驻韩使馆保存档案》系列的各宗档案,下文引用时将不再另行说明),《援护朝鲜事已派拨兵轮驶往烟台听候调遣》,档案号01-25-009-01-015。

第四条:两国商民前往彼此已开口岸贸易,如安分守法,准其租地、赁房、建屋。

中国商民准入朝鲜杨花津、汉城开设行栈。^①

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的缔结在近代中朝关系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依此条约朝鲜开放海禁,开展两国海上贸易,同时两国商民可至对方开放口岸经商定居。这为两国人民定居、经商提供了法律保证。特别是在条约的保护下中国商人可以进入朝鲜的首都。汉城对外开放这一事件史称“汉城开栈”。1883年,仁川开埠通商以后,打开了山东与朝鲜间交流的窗口,中国商人正式进入朝鲜。另外根据第一条规定,清政府考虑“朝鲜口岸初开,中国商民前往经营贸易自必日臻繁盛,时有彼此交涉事件”,^②特派陈树棠为总办朝鲜商务委员对中朝贸易进行管理。

1883年9月16日,陈树棠抵达汉城,17、18日接见华商及朝鲜政府官员,20日正式开始处理朝鲜商务事宜。^③他在1885年9月离任前的两年间为朝鲜华商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在汉城设立了中国总办商务委员公署,又分别在仁川、釜山和元山设立商务分署。同时,他在仁川清国租界的划定,朝鲜与上海间定期航运线路的开通,对华商的护照颁发及土地、房屋的购买,清人的居留保护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④陈树棠的外交活动为初期华商在朝鲜营造了非常宽松的经营环境。

①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04~407页。

② 《档案》,《委派二品衔候选道陈树棠为总办朝鲜商务委员》,档案号01-25-012-01-043。

③ 《档案》,《朝鲜商务委员陈树棠申报行抵汉城及开办馆务日期》,档案号01-25-013-02-002。

④ [韩]孙祯睦:《韩国开港期都市变化过程研究》,韩国首尔一志社1982年版,第203页。

自1883年起,“派员办理朝鲜商务章程内阁”在每年的年底要将朝鲜华商的往来及纳税情况上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据台湾所藏档案显示,1883年,汉城一共有华商59名,他们分布于19家店铺中。其中山东商人有41名,在全部华商中占69%;山东店铺一共有13家(中华兴、和兴顺、汇记、和祥、恒泰兴、公和顺、仁丰棧、复祥盛、永源顺、福有号、德兴成、公盛和、福兴),在全部华商店铺中占68%。麻浦是汉城的内港(现在属于汉城地区),当地一共有24名华商,他们共开设了4家店铺,而其中山东商人开设的店铺有3家(裕昌、德祥、协源顺船),共有18名商人。^①

韩国的《中央日报》曾报道过山东店铺公盛和的老板,说他于1883年10月来到汉城,时年33岁。刚到汉城时仅从国内带来了价值60两的各种杂货,开业不到一个半月就在中部长通坊购置了13间(相当于62平方米)土地和店铺。另一家山东店铺利成信从1883年9月至1884年的一年多时间里,共购置了450余间(相当于2000余平方米)的土地和店铺。^②

在1883年仁川开埠及汉城开棧的当年,就有几十名山东商人来到汉城开设店铺,而且无论是在人数还是店铺数量上,他们在全部华商中均占有一定的优势。其原因在于山东半岛的烟台与仁川港间有了定期航线,帆船及客轮的运行使华商来往更加频繁。另外,陈树棠也给华商莫大的支持,韩国华侨秦裕光在他的回忆录中曾积极评价陈树棠赴任以来的工作。^③因此山东商人初到汉城时,在陈树棠及清军的庇护下生意是比较顺利的。

1884年在汉城的华商总人数达到了352人,较1883年有了大

① 《档案》,《陈树棠申呈光绪九年份华商到汉城麻浦仁川三处人数及完纳海关进出口税并船钞银数》,档案号01-25-013-02-029。

② (韩国)《中央日报》1979年9月21日。

③ 秦裕光:《旅韩六十年见闻录》,台北南亚彩色印制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13—14页。

幅的增长。其中有字号的商人为 164 人,他们分布在 48 家店铺中。而没有字号,从事小贸易者高达 188 人,总数超过了有正规店铺者。其中山东商人总数也达到了 234 名,在全部华商中占有 66% 的比重,这一数字与 1883 年的山东商人数量相比增幅巨大。山东商人中有字号的商人为 110 名,分布于 37 家店铺中,而没有字号的小商人也高达 124 人。^① 山东商人的店铺如下表所示:

表 1 1884 年山东商人的店铺字号及其雇佣人员数

永来盛 (6 人)	中华兴 (6 人)	利成信 (6 人)	同裕号 (5 人)	源盛号 (5 人)	公盛和号 (5 人)	和顺号 (4 人)
福有号 (2 人)	永源顺号 (2 人)	三和顺 (3 人)	双兴号 (4 人)	生顺号 (2 人)	利顺号 (1 人)	恒泰兴 (2 人)
吉昌号 (5 人)	公成福 (1 人)	利泰恒 (1 人)	三泰号 (3 人)	汇记 (1 人)	吉盛号 (4 人)	恒义和 (1 人)
公和顺 (2 人)	聚昌号 (2 人)	齐鲁信 (2 人)	公源利 (4 人)	双合祥 (1 人)	福源号 (1 人)	福顺义 (3 人)
聚盛号 (4 人)	义合居 (4 人)	复兴馆 (3 人)	福茂盛号 (3 人)	义和斋 (3 人)	合兴号 (2 人)	福兴号 (2 人)
三合义号 (3 人)	东海兴号 (3 人)					

数据来源:《档案》,《咨送光绪十年份在韩华商名册及关税数目清折》,档案号 01-25-018-01-008。

备注:部分山东商人开设的店铺雇佣外地人。

根据表 1 可知,与 1883 年的情况相比,在汉城的山东店铺有了很大的发展。从人员数量上看,像中华兴、公盛和号等 1883 年开设的店铺在山东店铺中是最大的,共雇佣了 5—6 人,而其他的山东店

^① 《档案》,《咨送光绪十年份在韩华商名册及关税数目清折》,档案号 01-25-018-01-008。

铺普通雇工人数为3—4人。另外,仅有1—2人,仍处于创业阶段的店铺也占有很大的比重。1884年,山东华商大幅增加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陈树棠的活动无疑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可以将其视为清政府鼓励国内商人投资朝鲜的结果。并且1884年在日本所操纵的“甲申政变”失败后,华商在朝鲜的实力也有了凌驾于日商之上的趋势。^①在朝鲜,华商地位的提高必然吸引更多的商人进入朝鲜。这些华商当中出身于山东者,由于地理、历史上的优势到朝鲜比较容易,但商业规模并不大。规模较大者可以从事山东和仁川之间的贸易,而一般的山东商人都从事朝鲜国内的商业。^②但我们更应该清楚地看到,一部分资本较多的山东人可以经营店铺。尽管如此,没有店铺,只靠小贸易维持生计者仍占大多数。由此可见,在朝鲜的山东商人并不全是富有者,为生计投奔于此地者也并非少数。

1885年,汉城的华商数和山东商人数分别是111名和55名。^③这一数字较1883年有所增长,但与1884年相比降幅较大。有学者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1884年仁川的清国租界划定以后,在陈树棠鼓励下大部分商人已经于1884年来到朝鲜。^④笔者认为档案上的数字是针对当年在汉城华商的统计,若1884年以后在朝鲜的华商总数没有减少,1885年华商的统计数字不会变少。所以1885年华商人数的减少与1884年的大规模入朝似乎没有必然的联系。而致使该年度旅居汉城之山东商人减少的根本原因在于汉城商业形势的混乱。1884年,李范晋事件和李顺喜事件发生后两国民间的诉讼事件不断,进入1885年以后,中朝两国的民间债务纠纷接连发

① 秦裕光:《旅韩六十年见闻录》,台北南亚彩色印制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20页。

② 马仲可:《山东华侨研究》,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页。

③ 《档案》,《咨送光绪十一年份朝鲜仁川各口及汉城华商名册》,档案号01-25-020-02-021。

④ 李玉莲:《仁川华侨社会的形成和展开》,韩国仁川文化财团,2008年,第78—79页。

生,又有多起针对商店和住宅的盗窃事件,而朝鲜政府的行政能力也值得怀疑。同时,日本人也于1885年开始入住汉城。^①当时正是中朝政府围绕“汉城撤栈”与否进行激烈交涉的时期,再加上种种对华商不利事件的发生,必然使一部分原有华商放弃在汉城的经营而回国,来汉城的山东商人也会相应减少。另外,1885年6月驻朝鲜的清军全部撤出了朝鲜,华商从此失去了军事力量的保护。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山东商人投资朝鲜市场的决心。

三、袁世凯及徐寿朋时期的山东商人

1885年10月,袁世凯替代陈树棠负责管理朝鲜事务,他不仅掌管着朝鲜的通商事务,而且还参与朝鲜的内政外交,成为了朝鲜王国的实际支配者。经过他与朝鲜政府的交涉,华商可以在汉城继续经营、居住。并且以保护华商为理由,于1889年在德寿宫附近增设了一块中国人居留区域,并设立了清国警察署。袁世凯赴朝后,采取强硬措施,不仅对朝鲜政府专横跋扈,对当地的华商也采取强硬态度。但他在朝鲜期间所采取的行动,对于华商实力的增长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②因此可以说,从1885年袁世凯赴任到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正是朝鲜华商发展的关键时期。

到1889年为止,汉城的华商店铺已达到100家,人数则达到了513名。其中山东人开设或雇佣山东人的店铺有60家,完全没有山

① 孙祯睦:《韩国开港期都市变化过程研究》,韩国首尔一志社1982年版,第182页。

② 孙祯睦:《韩国开港期都市变化过程研究》,韩国首尔一志社1982年版,第188、206页。

东人参与的店仅有 16 家。^① 当年山东商人和各店铺所雇佣的山东人总数达到了 230 名,另外,住在各店铺和旅馆中的小商人和一般劳工也有 140 多人,山东人在华人中占到了 70% 以上的比重。不仅山东商人的店铺在全部华商店铺中占有绝对的优势,而且在汉城的山东人数量也占到了半数以上,由此可见,此时山东人在汉城华商中的优势愈加明显。山东人的店铺一般由 3~7 名同乡组成,多的有 10 名山东人,少的只有 1 人。并且在山东商人开设的店铺中雇佣外乡人的情况非常少,更未见到雇佣朝鲜人的店铺。这一做法对严守商业秘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山东商人店铺的具体情况如下表:

表 2 光绪十五年(1889 年)汉城的山东人店铺

同庆和(10)	源顺号(6)	东升永(4)	天成义(3)	公兴盛(3)	荣丰盛(2)
双盛泰(9)	宝泰园(5)	公源兴(4)	增祥号(3)	吉泰号(3)	广信记(2)
汇泉居(7)	福兴号(5)	协增号(4)	登莱馆(3)	仁记(3)	鸿祥号(2)
涌顺福(7)	恒利昌(5)	义和成(4)	玉祥号(3)	义兴号(3)	益顺磨房(1)
锦成东(7)	公和顺(5)	义顺盛(4)	仁德堂(3)	和兴成(3)	双兴成(1)
宝兴盛(7)	吉昌东(5)	东顺利(4)	双兴德(3)	义盛号(3)	永利铁铺(1)
永来盛(7)	凤华泰(5)	永顺公(4)	东兴永(3)	德昌祥(2)	义聚号(1)
和顺号(7)	仁昌盛(5)	天顺泰(4)	复盛号(3)	义和兴(2)	永盛和(1)
北公顺(6)	福昌兴(4)	聚兴号(4)	义和兴(3)	三合顺(2)	同兴号(1)
公源利(6)	裕和昌(4)	吉和成(4)	大兴顺(3)	源兴号(2)	泰和祥(1)

数据来源:《档案》,《华商人数清册:汉城华商及西、日人姓名清册卷》,档案号 01-41-040-19。

此后,在 1891~1893 年间汉城的华商基本保持上升态势,1891

① (双顺和、怡泰号、广泰亨、同顺泰、怡泰洋行、安昌洋行、福星面包房、成衣铺、润记行庄、谨记、形成号、来利、复新号、桂洞机房、琉璃瓦厂、五香居),这些店铺主要由中国南方商人开设,主要由广东、浙江、江苏和直隶商人构成。

年为 751 人^①,1892 年为 957 人^②,到 1893 年为止,汉城的华商店铺总数达到了 142 家,商人为 1254 人,资产总额超过了 35 万两。北洋大臣李鸿章在上报总理衙门的奏折中曾指出,朝鲜“近年商务日盛,户口甚繁。”^③虽然此间的档案未对汉城的山东商人进行详细统计,但从华商总人数的增加上可以推知山东商人的数量增加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1894 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袁世凯于 6 月 17 日(阴历)穿便服,经仁川出逃,清公使馆变成了一座空宅。与此同时,清国的警察也纷纷撤回国内,华商纷纷回国,仁川开往山东的船只几乎全部满员。^④而日商则在军队的保护下,涌入朝鲜开设店铺,将日本商权扩展到朝鲜各地。1895 年战争结束以后,华商开始大规模返回朝鲜与日本商人展开商业竞争。^⑤截止至 1910 年底,在汉城的华商人数为 1828 人,而同期的日本人有 34,468 人,战后华商的势力虽然很快恢复,但与日本势力相比已经大为衰退。^⑥

光绪二十四年(1888 年)12 月,徐寿朋接任唐绍仪之职,被委任为驻朝鲜商务总办。他于 1899 年对在朝鲜的华商进行了户籍统计。^⑦通过这份详细的档案资料,可以分析出在汉城活动的山东商

① 《档案》,《咨送光绪十七年份朝鲜各口华商清册》,档案号 01-25-029-02-029。

② 《档案》,《咨送朝鲜汉城等处铺户人数清册》,档案号 01-25-031-01-025。

③ 《档案》,《咨送光绪十九年份朝鲜各口华商总数清册》,档案号 01-25-032-02-015。

④ 孙祯睦:《韩国开港期都市变化过程研究》,韩国首尔一志社 1982 年版,第 209 页。

⑤ 《京城府史》第二卷,韩国首尔京城府,1934~1941 年,第 645 页。

⑥ 孙祯睦:《韩国开港期都市变化过程研究》,韩国首尔一志社 1982 年版,第 209~210 页。

⑦ 《档案》,《华商人数清册:华商户口名册》,档案号 01-41-056-04。

人的一些特点。当年在汉城除部分广东商人、浙江商人和直隶商人外,山东商人在人员数量和店铺数量上均占有绝对的优势。山东人共有 744 名,除去 10 名菜农,9 名在店铺中暂居者和 48 名一般居住人员外,共有 677 名山东人从事商业活动。他们分布于 124 家店铺中,平均每家店铺的雇员为 5.5 人,此时山东商人店铺的规模有了一定的发展。这些店铺主要分布在汉城的北大街、二宫街、草洞、大贞洞、红夏门和大西门一带。这 124 家山东商人的店铺如下表所示:

表 3 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汉城的山东人店铺

聚盛火食铺	安合号	包子铺	北源棧	成记	诚德号
德聚盛	德盛兴	东昌恒	东昌盛	东昌义	东来号
东升号	东盛福磨坊	东盛义	东顺兴	东泰兴	东兴隆
东兴木铺	东兴顺	丰盛永	福昌奶铺	福兴居	福增兴
阜盛号	复合兴	傅利局	干顺泰	干佑兴	公和顺
公盛同	公源福	公源利	广盛泰	广顺号	广兴隆
合昌	合发堂	合盛磨房	和春园	和丰成	和盛泰
和信记	恒发祥	恒丰益磨房	恒利成	恒盛兴	洪顺福
洪泰东	洪泰兴	洪兴馆	洪兴居	汇泉居	火食铺
饺子铺	金升泰	锦成东	九成园	连升东	隆福泰磨房
卖花生	磨房	仁兴利	瑞盛春	润发盛	三合堂
三合兴磨坊	是亦堂药局	双合成	双和义	双盛泰	双兴号
双兴泰	双兴义肉店	水屋子	泰生春记	剃头铺	天成仁
天和泰	天聚恒	天兴义	天兴斋	同和东	同和祥
同庆和	同盛义磨坊	同顺昌磨房	同顺成	同兴福	同兴顺磨房
同源兴火食铺	瓦匠	万源兴	洗衣铺	仙芍居	协昌盛
协成号	信局	兴茂盛	兴盛居	义成号	义和成
义盛号	义顺成	义顺兴	益盛泰	益兴顺肉店	永丰福
永福源	永合信	永来当	永盛东	涌泰磨房	裕成义
裕丰盛	裕盛馆	裕盛仁	元春盛	源发顺	源兴号
杂货铺	增盛和	增盛同	珍香源		

数据来源:《档案》,《华商人数清册:华商户口名册》,档案号 01-41-056-04。

如上表3所示,山东商人在汉城的店铺不仅在数量上有了较大的发展,而且经营范围也有所扩展。山东商人不仅从事传统的商业贸易,而且开始涉足饮食业和服务业,奶铺、肉店、药店、磨房和火食(伙食)铺的数量不容忽视。

在全部744名山东人中,其中山东登州府人626名,占总数的84%;山东莱州府人为100名,占13%;青州府人6名,济南府人5名,曹州府人2名,此外住在山东店铺和旅馆中的外地人也有几名。因此可知,当时在朝的山东人大多来自登州府。档案中626名登州府人中的612有详细的籍贯纪录,其中福山县人205名,宁海县人201名,黄县人78名,蓬莱人73名,文登人22名,莱阳人13名,荣成人8名,昭远人4名,栖霞人4名,海阳人3名。在登州府人中,福山县人、宁海县人、黄县人和蓬莱人以557名91%的比重占绝对优势。

大部分在朝山东人的出生地为山东的登州府和莱州府的沿海地区,其中来自福山县和宁海县者最多。这两个区域再加上黄县和蓬莱县正是现在烟台所管辖的区域,因此可知当时在朝鲜的山东人基本上均来自烟台。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沿海地区的山东人可以利用便利的海上交通到达朝鲜。不仅山东有这种现象,当时在朝鲜的浙江人和广东人也多是因为有中朝航线才得以前往朝鲜。与此相反,若从山东内陆的济南等地前往朝鲜则交通相当不便,所以在朝鲜的山东人鲜有来自山东内陆地区者。

通过此档案再考察山东人的年龄结构可知,年龄最小者12岁,最大者为68岁,但全体山东人的平均年龄仅为30岁。由在朝山东人的年龄呈现年轻化的趋势可知,他们来朝鲜的目的多为赚钱,而此处并非享乐之地。其中商人的平均年龄仅为29岁,在朝山东商人主要由年轻人构成。但大部分店铺中都有一位年长者,而其他成员则多为年轻人。即大部分山东店铺中有“一老多小”的现象。有趣的是,在朝鲜种菜的山东人则年纪偏大,平均年龄为42岁。

1861年,烟台的开埠通商为山东商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商业机

会,他们通过烟台港的国内外贸易积累了丰富的商业经验。1883年,仁川的开埠通商更是打开了烟台通往朝鲜的商业之门。在清政府的政策扶持下,商人们出于商业利益的诉求开始进入朝鲜市场。那么汉城中为数不少的小商人又为什么要远离山东故土呢?

解决家庭生活困难的方法有很多种,其中让家庭成员中的男劳力到外地谋求生计一般是最先采用的方法之一,而移民则是最后采取的措施。^①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山东人口的增加,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矛盾日趋严重。截止咸丰末年,山东人口已增长到3400万,平均每人占有土地不足3亩,远低于维持生计的水平。农民们为了生计不得不变卖土地,迁徙他乡,甚至沦为马贼。^② 在混乱的政治经济形势下,部分中国人为了生计也开始向国外移民。就像广东人与福建人多向东南亚移民一样,山东人则借助理优势多迁往朝鲜半岛。韩国华侨秦裕光在回忆其父亲最初移民的原因时是这样记载的:

家父当时移住韩国的原因并不完全是为了赚钱,最大的原因是当时社会的不安。1910年离乡来新义州时,正是清朝末期,社会局势非常不安,到处有马贼抢劫,国家的行政力腐败,使大陆民情呈现一片混乱。各地之马贼、土匪又专以乡镇的富农、土豪为对象。在这种情形下,家父自然亦成他们抢劫的目标,一旦受到抢劫,轻则财产尽失,重则丧失生命。故在这种不得已之下,家父才舍了家乡迁来韩国。更糟的是于1898年前后,以山东省为首之华北一带,出现了义和团组织……此暴动组织的产地——山东省当时更是一片混乱,所以许多人在失意中为了安全,独身或是带领家族便离开家乡。这批人部分迁到距我国山东

① Philip A. Kuhn.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9, p. 14.

② 逢振镛、江奔东:《山东经济史》,济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省最近的韩国定居下来,韩国华侨一直是以山东省人为最多。其原因即是如此。^①

从以上引文可知,并非所有的山东人都是为了赚钱而来到朝鲜半岛的,由于社会的不安定而被迫迁徙者大有人在。特别是在义和团运动爆发以后,山东局势进一步恶化。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离开故土,而山东人则可以借助其地理优势前往朝鲜半岛。此时从上海经烟台直达仁川的定期航线已经开通,便利的海上运输又在很大程度促进了两地人员的往来。因此可以说,19世纪80—90年代,山东局势的混乱是促使山东商人进入汉城的重要原因。

四、结 论

1882年“壬午兵变”以后华商开始进入朝鲜,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为中朝贸易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法律保障。山东商人借助地理上的优势开始进入汉城。在最初的几年间,由于陈树棠的外交努力和清兵的保护,山东商人在汉城的实力逐渐壮大。袁世凯接办朝鲜商务以后,采取强硬措施对华商进行保护,此间山东华商的人数和店铺数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中日甲午战争之前,山东商人在汉城地区的全部华商中已占有了绝对的优势,没有山东人参与的华商店铺寥寥无几。中日战争期间在朝鲜的华商受到了日本商人的排挤,但战后很快就恢复了实力,而且山东商人在汉城的实力与战前相比更为强大。

大部分的山东华商来自山东的沿海地区,其中来自烟台者占绝大多数。并且他们都很年轻,平均年龄仅有30来岁。但一般的山东

^① 秦裕光:《旅韩六十年见闻录》,台北南亚彩色印制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4—5页。

店铺都有一位年长者,即“一老带多小”现象比较普遍。山东人开设的店铺一般不会超过10人,3~7人的店铺则比较常见。更重要的是,山东商人开设的店铺很少会雇佣外乡人,更不会雇佣当地的朝鲜人。山东商人的这一做法对于保守商业秘密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通过对台湾档案资料的考察可知,并不是所有的山东商人都很富有,他们中大部分只能从事小买卖。而没有店铺的小生意人的数量也不容忽视,当时混乱的国内形势是促使他们远赴汉城谋求生计的重要原因。